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政法

纪念版

# 非洲的政治制度

[英] M. 福蒂斯 E. E. 埃文思 - 普里查德 编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政法

纪念版

# 非洲的政治制度

[英] M. 福蒂斯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编

刘真 译

刘海涛 校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的政治制度/(英)福蒂斯,(英)埃文思-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政治、法律、社会学)

ISBN 978-7-100-14931-0

I. ①非… II. ①福… ②埃… ③刘… III. ①政治制度—非洲 IV. ①D740.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988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非洲的政治制度

[英] M. 福蒂斯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编

刘真译

刘海涛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931-0

---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36.00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 政治人类学的遗产和当代视阈(代译序)

朱晓阳

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分支的出现是以一本书为标志,它就是读者面前这本《非洲的政治制度》。今天读这本出版于1940年的书,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它远非预设的那般旧。相反,从当下人类学视角的“政治”去看,这本书在内容和知识论方面的贡献对于今天的学人和读者仍然很有意义。也许这是现在的读者更急欲了解的,但本文先从这本书的内容和路径开始谈起。

在学科史上,《非洲的政治制度》一般被认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案例之一。这在当时是主流的路径。《非洲的政治制度》的作者多受到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路径影响。后者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好像是为书定了调子一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那里,社会人类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实证主义)去研究非西方社会的一门科学。这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包括归纳法和从个别现象中发现“齐一性(uniformity)”(本书翻作“一致性”)的规律、模式或结构。以下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一段话: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门自然科学,社会人类学的任务是系统地调查社会制度的性质。自然科学的方法总是依赖于对观



察现象的比较,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多样性的仔细考察,发现潜在的一致性。比较方法是归纳推理的一种工具,它应用于人类社会,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属于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基本的特点,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些相信真正的人类社会科学是有可能的也是可期待的人,必定会将不断获得这类知识作为其目标。”<sup>①</sup>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还包括“比较研究”,这也是《非洲的政治制度》所依循的路径。在本书出版的那个时代成为很多社会科学学者(包括人类学者)重要想象力来源的还有“功能论”。

就政治研究而言,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框架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说,重点观察的是政治组织。按照约翰·格莱德希尔的评述<sup>②</sup>,拉德克利夫-布朗将韦伯式的政治社会说用来规范非洲政治制度作者们的研究视阈。这些视阈包括政治是关于国家概念——即在一片领土内,对暴力拥有垄断使用权力的政治组织——的统治活动。因此在对非洲政治观察时,“组织”成为研究者的主要观察范围。具体做法是将非洲政治制度归纳为两类:有头领或集中组织的社会,无头领或集中组织的社会。这种分类体现的正是政治组织“有/无”的二分格局。

<sup>①</sup> 拉德克利夫-布朗:“前言”,《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第5页。

<sup>②</sup> John Gledhill: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London and Boulder: Pluto Press, 1994.



将《非洲的政治制度》用以上二分格局来概括过于简单。其实该书的民族志内容很丰富。例如格拉克曼关于祖鲁人的政治制度描述包括其政治制度在殖民统治下的变迁。这种对现实和实际行为描述的路径后来被格拉克曼发展成“延伸个案方法”(extended-case methods)或“情景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这一新的路径是结构功能论以后政治人类学的一次范式转变。今天它被称为“过程论”。

无论该书作者和编者所秉持的是结构功能论范式,还是其中显露的“过程论”端倪,都没有减低这些研究者对于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确定性和他者政治可理解性的信心。这种信念是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人类学政治研究大相径庭的。

对于今天的政治人类学来说,《非洲的政治制度》的意义正在于其关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理解性”的坚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这些特点常常被视为老套人类学的说辞。当时的政治人类学会更多关注对政治象征的阐释,会更强调权力、阶级和性别等。在讨论这些主题时,民族志作者对于能否理解“他者”的反思,对于能否翻译他者文化的争论等构成民族志的一个重要内容。与这些新取向相比,《非洲的政治制度》的如实观察被批为“上帝之眼”的观看。

从今天的眼光看,《非洲的政治制度》的价值正在于这些“如实观察”。这些基于时代情景的观察,犹如纪录影片,随着时间磨砺,越显出其宝贵的价值。在此之外,由于当下人类学,包括政治人类学正在出现“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





的趋势<sup>①</sup>，《非洲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实在的观察正与当下的本体论有了穿越时间的对接。当然两种本体论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知识论壁障，因此不可说今日之本体论正是当年拉德克利夫-布朗所云之某某。

任何人只要读过一本社会文化人类学概论一类的书，都会知道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到当下的人类学之间立着该学科史，甚至社会科学史上的一些范式地标。它们是如：结构主义、阐释/象征论、实践理论和公共/担当人类学等等。

在人类学学科史上，强调归纳法，并以此作为发现政治制度“齐一性”为目标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对于强调演绎概念和阐释表

---

① 人类学界关于“本体论转向”的讨论集中出现在美国人类学学会 2013 年年会 (AAA) 上。参见 John D. Kelly, “Introduction: The Ontological Turn in French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 4, no. 1, 2014, pp. 259—269; Martin Paleček and Mark Risjord, “Relativism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withi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3, no. 1, pp. 3—23; Kirsten Hastrup, “Social anthropology: Towards a Pragmatic Enlightenment?” *Social Anthropology*, vol. 13, no. 2, 2005, pp. 133—149; Richard A. Wilson, “The trouble with truth,”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0, no. 5, 2004, pp. 14—17. 朱晓阳：《“表征危机”的再思考：从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和麦克道威尔 (John MacDowell) 进路》，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6 辑，北京：中国国际图书出版公司，2008 年；《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 (2003—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近年来关于本体论转向的讨论，还可参见 Benjamin Alberti, Severin Fowles, Martin Holbraad, Yvonne Marshall, and Christopher Witmore, “‘Worlds Otherwise’: Archaeology, Anthropology, and Ontological Differenc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2, no. 6, 2011, pp. 896—912。中国最近关于本体论转向的讨论，可见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第 3 期，25—38 页；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思想战线》，2015，第 5 期，第 1—10 页；郑玮宁：《人类学知识的本体论转向：以 21 世纪的亲属关系研究为例》，《考古人类学学刊》(台湾)，2012，第 76 期，第 153—170 页。

征为路径的政治研究来说曾经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取向。其案例如《非洲的政治制度》的作者之一,埃文恩-普里查德在1950年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演说称:“社会人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sup>①</sup>。再一例是此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不是探寻齐一性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sup>②</sup>。但在今天这两种知识论进路确实显示出相互包容和补充的趋向。在当代政治人类学中出现的“本体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sup>③</sup>就是一例。

以安第斯-亚马孙人类学为例,本体政治将过去视为宇宙观的东西,如山神、地母,或如当地人所称之“大地之在”(earth-being)当作实在或本体,并要求给予其政治或宪法上的权利承认<sup>④</sup>。这种本体政治将地方性的种种“实在”从话语、表征、宇宙观、阶级政治、产权清晰、环保运动甚至性别政治的“绑架”中解放出来,视为他者所居的世界之一部分。因为所居者之身进入的“视角”(perspec-

① 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冷凤彩译梁永佳审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43页。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第一章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

③ 南美的本体论人类学对“本体性的政治(politics of ontology)”比较重视(Martin Holbraad, Morten Axel Pedersen and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The Politics of Ontology: Anthropological Positions”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line*, January 13, 2014, <http://culanth.org/fieldsights/462-the-politics-of-ontology-anthropological-positions>。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是南美原住民的宇宙观与地方性政治主张的关系。

④ 卡迪那认为西方式的政治观念图式是以“人-自然”对立为前提,而 earth-being 则将“山”看作有“精神”或“灵”的存在(being),大地之存在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被动客体,而是“行动者”之一。De la Cadena, “Indigenous Cosmopolitics In the Andes: Conceptual Reflections beyond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5, Issue 2, pp. 334—370.



tive)不同,这种“世界”呈现多样。这是所谓南美“视角论”(perspectivism)的基本主张<sup>①</sup>。这种本体论进而认为自然(或世界)是多元的,差异是本体性的。

再以笔者最近关心的“地势政治”为例<sup>②</sup>。“地势”在现代法律中是找不到的。但“地势”在中国是一种实在,也是政治生活中的实在,因此值得从政治、法律以及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城市规划等方面深入探讨。笔者曾另文提到:基层的政治实践者(包括村民/业主、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对地势问题非常重视。相反,社会科学界更多是从政治、经济等视角去看待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sup>③</sup>

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地势的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正是其所坚持的研究框架限制所致。这种框架如同《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的结构功能论和韦伯式政治社会研究范式的束缚一样,将“地势”这种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寻常的实在遮蔽住。在以权利-法律为

<sup>①</sup> Viveiros de Castro,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 *Tipiti: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 vol. 2, iss. 1, 2004, pp. 3—22.

<sup>②</sup> 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思想战线》,2015,第5期,第1—10页。

<sup>③</sup> 具体言之,社会科学界多是从法律规范的土地权和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等角度来处理土地-空间问题,地势在这些研究中,被视而不见。从当代马克思主义(例如戴维-哈维)角度,地势问题被视为“非均质空间”。这已经接近地势的意思,但“非均质”仍然是从一个文化与自然二分的社会科学的类分出发对空间的界定,与地势意涵的人事和地理形势相融贯仍然有区别。似乎只有“地缘政治”与地势最接近。地缘政治是一个真实存在但名声不好的概念。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现象经常被注意到,但一旦进入官方的对外政策文本,地缘政治这个词就消失了。这很大原因是“地缘政治”一词臭名昭著。在这些场合“地缘政治”往往被用来批评国际政治中的“他者”或敌对方的空间-政治活动。

本的社会,法律能够格式化很多问题,包括地势问题。例如一个合法的钉子户不会担忧有开发商或政府会以“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将其房子拆掉。司法已经基于人人平等这一均质空间抽象出一套规范制度。这套规范确实能有效地保护住个人的权益。相反,一旦产权易主,或司法决定做出,无论如何人多势众,推土机照样将房子推倒。一个例子是美国电影《愤怒的葡萄》中负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被债主拿走。债主不用顾忌这些失地农民有多少,所涉土地有多广大,只是按照司法决定行事,将其土地上的房屋推倒,将几十万农民撵走。这个例子表明,法律规范下的产权虽然框住了地势,但没有消除不公正,因此才有了《愤怒的葡萄》这种感天动地的作品。但在中国语境下,地势从深层到表象都非常触目,显得非常要紧。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将地势从隐蔽的地方突显出来。

由以上这两个案例可见当下政治人类学与《非洲的政治制度》之间在关于“实在”方面的异同。两种本体论的相通之处有以下几点:其一,承认政治现象是实在的;其二,“他者”文化可以被理解和翻译。

但两种本体论之间有很大差别。仍然以以上相通之处为例。其一,虽然两者都承认政治现象是实在的,但《非洲的政治制度》式的本体论认为可以用西方政治学适用的权力、组织-结构来概括他者的政治实在性,而本体政治论者认为,安第斯-亚马孙政治的实在包括“大地之在”或其他非人类的存在。其次是文化可翻译性。结构功能主义政治人类学认为非洲他者的政治系统可以用“权力”、“组织”和“功能”等来翻译,这种翻译能很好地解释非洲的政



治现象。安第斯-亚马孙本体政治论者认为,虽然当地的政治表达可以用“land(土地)”、“阶级差别”等与西方左翼同盟者共享的词汇翻译,但同一词汇中包含“含混”(equivocation)。这种含混是来自不同人各自所进入的“世界”(复数)的差别。例如同样是“land”(土地),但安第斯-亚马孙人的 land 之意含有“大地之在”(earth being)。这与西方左翼盟友“land”的含义(更多指向“土地权”)是有本体性差异的<sup>①</sup>。这种差异性造成共享语词的含混。

简言之,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他者”政治(例如非洲)是实在的,可以用西方政治研究的分类和框架来研究,研究的路径是自然科学式的归纳法,其目标是发现政治现象的齐一性。从本体政治的视角看,“他者”政治(例如安第斯-亚马孙地区)也是实在的,但其与西方政治视角下的实在有差异,这种差异是本体性的差异。即使他者政治能够被用与西方政治相同的语汇翻译,其共享的词汇背后存在含混性。对他者政治的研究路径可以是自然科学式的归纳法,在一定范围内会概括出“齐一性”,但是对他者政治的“差异性”的揭示需要通过演绎、分析的方式进行。在研究中可以用共享的词汇翻译并阐释他者政治,揭示出同一语汇背后的差异性,也可以用他者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本体差异性”。最后这一点,将导致“用巫师的语言抒写关于巫术的民族志”的正当和合理。

<sup>①</sup> De la Cadena, “Indigenous Cosmopolitics In the Andes: Conceptual Reflections beyond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5, Issue 2, p. 355.



## 致

皇家学会院士 C. G. 塞利格曼博士  
他为非洲民族学研究做出的贡献  
值得尊敬和仰慕

# 目 录

编者按..... 1

前言 ..... 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A. R. Radcliffe-Brown),  
文学硕士(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名誉教授 4

导论 ..... M. 福蒂斯博士(M. Fortes)和 E. E. 埃文思-  
普里查德教授(E. E. Evans-Pritchard) 19

本书的目标。非洲社会的代表性样本。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所研究的两种政治制度类型。政治组织中的亲属关系。人口的影响。生计方式的影响。混合政治制度和征服理论。地域层面。政治制度中的力量平衡。组织化力量的影响和功能。对欧洲统治的不同反应。与政治职务相关的神秘价值观。政治群体的局限性的问题。

南非的祖鲁王国 ..... 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  
学士(荣誉)(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博士(牛津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 44

历史介绍。祖鲁国王和国家。地位和政治权力。民族内部的部落。权威的制裁和国家的稳定。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欧洲统治时期。结论。

贝专纳兰保护国恩瓜托人的政治组织 ..... I. 沙佩拉  
(I. Schapera), 硕士(开普敦大学), 博士(伦敦大学),

南非皇家学会院士。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 80  
族群构成和领土构成。管理制度。酋长的权力和权威。酋长地位的权力与责任。

罗得西亚东北部本巴部落的政治制度…… 奥德利·I. 理查兹  
(Audrey I. Richards), 硕士(剑桥大学), 博士(伦敦大学)。

剑桥大学英联邦研究高级讲师 109

班图政治组织——一些总体特征。本巴部落: 部落构成—社会分组—亲属关系—地方分组—等级—社会分组的其他原则—经济背景—白人管理。权威的基础: 继嗣规则—血统和继位的法律规定。领导地位的职能和特权: 头领—酋长。政府机器: 管理—军事—司法—顾问。部落整合。欧洲统治后的变化: 引入新当局—1929年条例的影响。

乌干达的安科勒王国 …………… K. 奥伯格(K. Oberg), 硕士,

博士(芝加哥大学) 149

传统和历史背景。政治地位。国王和王室村落。贡物。对王室鼓的崇拜。继位。结束语。

克德: 尼日利亚北部的河边国家 …… S. F. 纳德尔(S. F. Nadel),

博士(维也纳大学), 博士(伦敦大学)。杜伦大学国王

学院人类学系高级讲师 195

介绍。人口。经济制度。定居点。政治组织: 酋长地位—“国家职务”—酋长地位的继承—“殖民地”的管理—税收—司法权—地域权利。自治要求。社会分层。整合机制: 经济合作和社区生活—传统和神话—宗教—结论。克德国的演变。

卡维龙多班图人的政治组织 …………… 根特·瓦格纳



(Günther Wagner), 博士(汉堡大学) 229

引言。政治单位的定义。内部政治结构:法律的制定—法律和习俗的延续—关系在不运行期间的延续—法律和习俗传承到后世各代—对违法行为的恢复。外部政治结构。政治权威的性质:长子继承权的特权—财富—作为领头长老的地位—勇士的声誉—拥有法术—宗教美德—年龄。

黄金海岸北部地区塔伦西人的政治制度 …… M. 福蒂斯, 硕士

(开普敦大学), 博士(伦敦大学)。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 270

国家和人民。政治制度的特点。战争。氏族制度网络和塔莱社会的基本分裂。限制因素:亲属关系、地域邻近和经济制度。世系制度的权威与责任。塔莱宗教。酋长地位和腾达拿地位。酋长和腾达拿的互补功能。腾达拿和更大社区。酋长和腾达拿的世俗权威。

南苏丹的努尔人 ……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硕士(牛津大学), 博士(伦敦大学)。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诸灵学院院士 307

分布。部落制度。世系制度。年龄组制度。世仇和其他争端。总结。

本书作者的补充研究 …… 333

索引 …… 334